

威胁、安全与和平:中美国家安全观文本的比较研究*

孙志伟

[内容摘要] 一国对外发布的安全文本是该国在安全议题上的政策宣讲与对外宣示,体现了其对国家安全局势与国际安全格局的思考。中美作为世界上综合实力位居前位且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其双边关系及对外交往,尤其是其安全政策,深刻影响世界局势。本文对中美两国发布的安全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中美两国国家安全观在解读威胁、实现安全与建设和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将安全与西方价值观挂钩,以军事霸权、对抗思维作为谋求绝对安全与霸权地位的主要工具。中国则始终高度重视世界整体和平,统筹安全和发展议题,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妥善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威胁。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观上的不同倾向使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行动。

[关键词] 国家安全观 文本分析 全球安全倡议 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 孙志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4)05-0136-19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综合实力位居前位且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其双边关系及对外交往,尤其是其安全政策,皆深刻影响世界局势。然而,由于文化根源、社会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观或以安全战略为起点的外交政策取向上存在显著不同。由此,两国在面对国家或国际安全议题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目前,学界对中美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涵盖意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安全教育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研究”(项目编号:2023ZD00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殷浩铖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意识形态、话语策略、博弈场域等诸多议题。有的学者将意识形态差异视作两国间各种矛盾和分歧的根源。例如,刘建飞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① 节大磊指出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② 有的学者以话语为中心来剖析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与安全互动。例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美更容易滑向“修昔底德陷阱”。^③ 孙吉胜则搭建起话语体系和安全观念建构的内在逻辑,指出不同话语可以使特定问题安全化。^④ 施旭在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分析框架上均有所研究。^⑤ 还有的学者关注中美两国在重要议题或地缘热点地区的具体博弈。在海权议题上,有学者对中美海权竞争、南海海权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⑥ 在亚太安全方面,有学者对中美在亚太的竞争、美国的亚太同盟关系与威胁感知等问题展开探讨。^⑦ 总体来看,既往研究已覆盖了中美国家安全观的不同领域,但文本研究可以提供一个更为深入和回归本源的分析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对中美两国发布的安全文本进行细致梳理,尝试揭示语言和话语背后的逻辑,力求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补充。

一、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的文本研究

作为一国安全理念和战略的系统化呈现,国家的安全观不仅是国家对外行

① 刘建飞:《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13~17页。

② 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84~108页。

③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p. 142~145.

④ 孙吉胜:《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第39~61页。

⑤ 施旭、冷唐菡:《国家安全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40~46页;施旭、李婧:《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研究》,《中国外语》2021年第4期,第12~18页。

⑥ 杨震:《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35~45页;凌胜利:《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61~81页。

⑦ 韩献栋:《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当代亚太》2021年第4期,第28~66页;杨文静:《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模式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29~37页;李岩:《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第3~22页。

为的引领性方针,更体现了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时持有的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通过将观念研究的宏观视角与文本分析的微观方法相结合,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复杂性,从而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更多实证依据。

(一) 文本研究方法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文本研究法有其独特价值,对该方法的运用也有一些要求。

其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应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从本质上来说,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要目的的外交行为仍由主权国家政府所控制。故以国际倡议、政府声明等公开发布的文件作为研究对象应是文本研究获得可信性的基础。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公开发布的官方文件,研究者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的脉搏,揭示出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层次和本质性问题。

其二,运用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能够同时兼顾宏观视角和微观细节,进而对相关政府文本形成综合性理解。文本或话语是国际关系运行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可以用于描述客观事物,还可以建构语义、观念和互动关系。^①在量化分析方面,研究者可以通过词频分析等定量的方法,识别和量化文本中的关键词、主题和叙事结构,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实质性的证据支持。在话语分析方面,通过分析政府文本在句式和选词等方面出现的语言策略和修辞手法,能够穿透文本背后“以言指事”“以言行事”的内在动机,进而理解国际行为体如何通过语言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②

其三,基于文本的比较分析是揭示国际安全现象和外交政策普遍规律、进行前瞻性分析的有效方法。一方面,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文本的异同,研究者可以识别出相关行为体的外交立场、战略目标、政策导向以及文化价值观,从而对外交行为和安全策略形成合理认识。另一方面,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

① 孙吉胜、袁莎:《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源起、现状与前景——孙吉胜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2~160页。

② 唐青叶:《话语政治的分析框架及其意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94~106页。

们通过剖析政策文本和现实措施之间的距离,也可以对一国的外交风格形成预期。这对于预测对方行为并制定应对策略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比较分析能够综合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而为国际关系文本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和多元的研究视角。

(二) 本研究选取文本的考量

从文本的整体视角来看,安全文本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集中体现,涵盖了一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安全关切。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安全文本对于指导国家谋求安全的行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些文本通常包含了国家对于威胁认知、安全实现,以及和平建构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它们不仅展示了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布局和行动计划,也为国际社会了解该国的安全政策提供了重要窗口。

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分析两国的安全文本能够呈现两国对于安全与秩序的认知,并对其后续行为做出回归本体、基于观念的整体性分析。鉴于此,笔者以文本分析为突破口,将中国的《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①和《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倡议》)^②与美国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战略》)^③进行文本解读和比较分析。其中,中国发布的《摘编》完整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宏观战略框架,《倡议》则是针对当下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提出的中国方案。与之对应,剖析拜登政府推出的《战略》有助于理解美国政府对于安全挑战与秩序建构等问题存在怎样的整体认知。通过对上述文本开展综合分析,本文旨在

① 该文件是习近平主席围绕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合集,对于新时代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建构、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集中反映了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上的思想建构及重点导向。

② 该文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涉及全球安全议题的概念文件,涵盖了大国协调、区域热点问题、信息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议题,力求以共赢思维应对安全挑战,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治理,反映了中国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安全挑战时的战略与愿景。

③ 该文件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对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全球战略、国家价值观等议题进行纲领性的阐释并订立政策基调,折射出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原则,阐明了将来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国家安全的基本理念。考虑到当下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情况日趋凸显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快速演变,本文认为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最具参考价值和说服力的官方文本之一。

从本体和整体的角度,深刻地、理性地剖析两国安全观的本质区别。

(三) 话语分析视角

在研究中美两国国家安全相关文本时,对句式选择和词语选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语言或话语分析是展开文本研究的起点和基础。^①

首先,分析中美两国相关文本中的语言风格和用词选择,可以揭示出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不同关注点。例如,中方文本更为强调“总体国家安全”,体现出综合和全局的安全观;而美方文本则更侧重“国家安全竞争”与“价值外交”等概念,强调对外部威胁的应对与防范。同时,识别并分析两国文本中使用的修辞手法,也可以帮助研究者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其次,社会文化语境也是理解中美国家安全文本的重要维度。将两国文本置于其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国家整体战略中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其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例如,中方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强调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统一;而美方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个体主义的政治传统,强调本国在国际层面的排他利益同国家安全的融合。

再次,跨文化对比是揭示中美两国安全观差异的有效方法。在当下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格局中,分析中美两国在处理具体的安全议题时存在的差异与共识,有助于理解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文化基础,探索两国在安全议题上的交流方式和合作潜力。^② 而剖析两国针对相同议题而采取的不同策略,也有助于理解两国后续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战略互动。

因此,本文通过将语言使用与修辞策略、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跨文化对比等要素纳入文本分析之中,力求全面深入地理解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策略与影响。这种多维度的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揭示文本背后的政治意图和价值观,也能为国际安全相关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实证支持。

^① 孙吉胜:《国际关系中语言与意义的建构——伊拉克战争解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43~55页。

^② 李明月:《朝核问题与中美核安全博弈》,《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2期,第3~27页。

二、解读威胁：中美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差异

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指导性作用建立在该国对各方面威胁认知的基础上,进而针对特定领域的威胁做出具体应对措施。^① 美国的《战略》与中国的《摘编》及《倡议》虽然都重点关注国家可能面临的威胁,但是中美两方对于“什么是威胁”“威胁来自何处”“如何应对威胁”等诸多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一) 威胁划定:价值观划线与共同体意识

中美关于各自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受两国关于安全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② 客观而言,两国的安全观均为自身的发展服务,但在如何界定所谓威胁与如何划定威胁等级方面,两国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一直以来,美国将自身打造成为国际社会的价值观标杆以及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在文本叙述上,美国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工具,将本国安全与所谓的自由民主挂钩。^③ 美国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角度塑造威胁认知,其所捍卫的安全主要是西方价值观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安全。美国的安全战略文本将“民主”“自由”等元素划定为美国的专属价值。《战略》中通过“我们的民主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美国的民主实验长期以来一直是激励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源泉”^④等话语,不断论证自身制度的“正确性”,并强调美国在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位居领导地位的合理性。^⑤ 在此基础上,美国将自身对于威胁的识别与应对与其捍卫西方价值观、塑造西式国际秩序的行为强行画上等号,并认为国际秩序建立在其

① 尹继武:《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3期,第151~158页。

② 刘国柱:《威胁认知、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6期,第34~43页。

③ 王浩:《权力、政治、结构: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1期,第62~86页。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⑤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1986, pp. 1151~1169.

利益与价值观之上。^① 在《战略》的文本中,美国认为其所受的安全威胁来自部分国家,指出:“我们的愿景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挑战,来自那些将威权治理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相结合的大国”。^② 这类表述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威胁的认知建立在价值观划线之上。美国将别国的正常发展和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界定为对美国自身安全的挑战,并将这种挑战夸大为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威胁。

相较于美国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角度界定威胁,中国政府对威胁的认知基于人类社会共处一个地球,国际社会发展共处一个安全共同体的基础理念。首先,中国对威胁的认知源自人类社会面临的客观威胁,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③ 论述用“既……也……”的并列关联词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威胁类型。其次,中国对威胁的认知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呼吁各国通过切实合作化解分歧,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倡议》中提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以及“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不可分割”。^④ 这类表述折射出中国在威胁认定中放弃了“价值观划线”,也体现出中国认为国与国之间应是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再次,中国重视威胁但却更加重视对和平的追求。面对当下世界和平充满挑战的大环境,《倡议》呼吁“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并肩守护地球家园的和平安宁”。^⑤ 这一表述清晰地指出中国应对威胁和挑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世界(而不是少数以价值观界定的盟友)的和平与发展。

(二) 威胁来源:塑造外敌与理性认知

除了对“什么是威胁”的认知的差异性,双方在威胁来源方面也有显著认知

① Amos A. Jordan and William J. Taylor, J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Proces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36.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33页。

④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⑤ 同上。

差异。历史上看,国际政治格局、国际安全、商业利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国内政治体制等因素均深度影响了中美关系发展,^①也同样造就了中美之间关于威胁来源的迥异观点。

建构外部威胁、刻意塑造若干假想敌是美国认识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方式。相关文本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美国将中、俄等国歪曲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也就是美国所面临的威胁的来源。《战略》全文分别有 54 处、68 处提及中国和俄罗斯,将中国界定为“唯一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日益拥有推动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的竞争对手”,认为俄罗斯“对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肆无忌惮地藐视当今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②在具体的地区热点问题应对方面,《战略》有 19 处提及俄乌冲突,并将欧洲价值观、全球供应链危机与人道主义危机等归咎于该事件。此外,《战略》也有 6 处提及台海地区,并明确表示“支持台湾的自卫,并保持我们抵制对台湾采取任何武力或胁迫手段的能力”。^③

不同于美国刻意塑造外部威胁的处理方式,中国更加注重剖析现实威胁与热点议题。以台湾问题为例,《摘编》指出:“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④这一论述清晰地表达了台湾问题的历史与事实。同时,《摘编》还强调:“‘台独’分裂势力……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⑤这一表述直接指出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来源。随后,《摘编》马上强调:“我们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⑥这又清晰地表述了台湾问题的解

① 王缉思、贾庆国、唐永胜等:《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24 年第 3 期,第 1~41 页。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③ Ibid.

④ 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7 日,第 1 版。

⑤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

⑥ 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7 日,第 1 版。

决方案。上述文本中折射出中国所面临威胁的现实性与解决方案的实在性,体现出中国从客观问题出发,而非寻找假想敌的威胁来源判定思路。

(三)与威胁认知相关的身份建构:敌我对抗与结伴互助

对威胁的判定与应对也可反映出国际关系行为体对本国在国际社会中身份的定位。一般而言,国际关系行为体基于不同的身份定位与利益偏好能够产生不同的互动模式。由于中美两国对于威胁定义与威胁来源的认识存在差异,两国对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的认识也呈现明显不同。

美国通过价值观划线、塑造外部威胁的处理方式将自己塑造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也更激发了强调敌我对抗的身份建构模式。一方面,《战略》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利坚合众国有更好的地位,使用自己实力和决心以发挥领导作用。”^①这一表述展现出美国对其自身领导地位的推崇与坚持。另一方面,《战略》认为美国应当“阻止那些与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世界的愿景不同的人的攻击”,^②致力于将美国自身打造为国际秩序和安全的捍卫者形象。在台海问题上,美国将中国大陆维护主权完整的行为歪曲为对台海地区与东亚秩序的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向台湾地区提供所谓的“自卫”武器。

有别于美国以敌我对抗思路建构身份认同,中国则希望打造“结伴互助、形如朋友”的共同身份,希望以合作化解分歧、以共识应对威胁。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上,尊重各国各地区文明的多样性,强调合作与共赢,力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中国遵从当下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际秩序,将自己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主导者或颠覆者。例如,《摘编》中明确指出“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③希望能够与各方携手“推动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朝着国家公正合理方向发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② Ibid.

③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展”。^①另一方面,中国坚持新安全观在外交与安全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②这一论述阐明了中国在解决实际威胁时的原则与立场。同时,中国重视多元的国际合作在应对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时的重要作用。在《摘编》中,中国主张:“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③

三、实现安全:中美国家安全观的举措分别

国家的安全状态是指国家的主权、政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且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④对实现安全的具体措施的选择源自对威胁的不同认知,更取决于不同国家对于安全的界定。由于中美两国在威胁认知上存在差异,其对于安全的界定也存在本质不同,双方在谋求安全时出现了不同行为方式。

(一) 实现安全的主要目标:传统安全与总体安全

伴随国际社会联系的不断加深,各国对国家目标的追求不断丰富、拓展,从简单强调军事安全这一传统安全目标,拓展至国家政治安全及领土权益,最终将人口流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囊括其中。^⑤中美两国在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议题上认识的差异则会影响两国在国际竞合、全球治理等多方面的战略选择,从而导致两国在应对相关危机时采取不同的措施。

美国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上,并强调通过各项政策和机制巩固其科技、经济实力,以维护本国的传统安全。美国虽对非传统安全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0页。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7/01/content_2893902.htm。

⑤ 张琳、赵佳伟:《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百年演进与现实启示》,《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2期,第1~10页。

威胁采取一定措施,但是其对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是被统合在传统安全战略和政策框架之内的。以气候安全为例,在美国颁布的《2040年前气候变化及国际应对措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中,美国政府将气候安全作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变量,并将气候安全统合进其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传统安全的治理框架内。^①在气候治理实践中,虽然拜登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以促进美国经济的低碳转型,但美国政府同时重视发挥国防部门和军事安全类智库的作用。^②由此可见,虽然气候等非传统安全在美国的安全内涵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但是现阶段远比不上传统安全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论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出现明显的阵营化倾向。如《战略》中提及流行病仅7处、气候变化仅21处、粮食安全仅9处,这些举例式的提及同对中国(54处)、俄罗斯(68处)的重视程度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对比数据展现出美国对于传统安全的高度重视,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让位于美国所主导的联盟式合作,成为其打压中俄等国的工具。例如,在能源领域,美国指责俄罗斯将其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武器化的行为导致了2022年全球能源危机的爆发。在流行病方面,美国指责中国“(如)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早期表现的那样,不愿与国际社会合作”。^③美国对于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以及建构“对抗式的联盟”的做法从本质上仍是传统安全至上,是零和博弈思维的延伸。

不同于美国的做法,中国将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议题并重,旨在全方位、多层次维护国家安全。首先,《倡议》中指出:“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呈现更加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④这一表述点明了当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并重且关系日渐紧密的特征,对当下复杂的安全形势形成了清晰的认识。同时,《摘要》指出:“如果发生

①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Increasing Challenges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2040,”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NIE_Climate_Change_and_National_Security.pdf.

② 李昕蕾:《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第81~109页。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④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①这揭示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对一国政治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此外,中国通过客观、务实的视角阐释了在未来一定时间面临的来自各方面、各领域的外部风险。《摘要》以较大篇幅详细阐述了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的风险,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领域,分门别类地表述了潜在的安全风险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并致力于通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高生产力等路径以规避安全风险。

(二) 实现安全的具体范围: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

中美两国在安全目标上的不同会导致两国在界定安全的具体范围上出现差异。这直接导致了两国在如何平衡自身安全与国际环境的问题上存在不同。

美国需要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奉行泛化的绝对安全观。在《战略》中,拜登就点明美国确保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扩大经济繁荣和机会;实现和捍卫作为美国生活方式核心的民主价值观”,并谋求“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有能力在追求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取得成功。”^②上述引文中同时涉及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国外交和国际地位,且按照“先本国后全球秩序”的顺序,最终将内政外交的观念统合在其国家安全的名目之下,赋予自己国际秩序创造者的地位,并排斥部分国家进入其主导的秩序。^③美方文本的结语中强调要“在竞争中击败我们的对手,塑造国际秩序,同时应对共同的挑战,包括将决定人类历史下一阶段的气候变化、大流行病防范和粮食安全。”^④其话语中的“击败”“决定”等用词均暴露了其塑造霸权、攻击臆想中的对手、谋求绝对安全的野心。为达到长久维持其霸权的绝对安全目标,美国主张运用投资、结盟、军队现代化等多元手段来巩固自身的利益与发展。《战略》全文一共有 80 余处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33 页。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③ 梁亚滨:《美国建立和维持霸权的偏好与方式变化:从接纳到排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8 ~ 42 页。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及“投资”,有67处提及“盟友”,也有17处提及“军队”。^①上述各方面都最终指向美国的绝对安全,并借保卫盟友、纠正不公平之名,行霸权秩序之实。

不同于美国以绝对安全谋全球霸权的认知,中国则奉行具有辩证思维的安全观,更注重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动态辩证关系。在中国看来,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国内发展方面,《摘编》强调“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②点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在构建积极有利的发展环境方面的正向作用。其次,中国谋求安全的举措注重与经济建设良性结合。相关文本中指出:“我们保持了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③这将基于国家安全保障下的安全环境视作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深化国家安全来确保稳定的内外环境,最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再次,中国的安全观最终落脚在人民共享上。《摘编》中指出:“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④这一表述体现出国家安全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民群众的福祉。

(三) 实现安全的文化逻辑:排他独霸与包容共生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日益频繁,促使各国安全观也产生不同特点。^⑤中美两国对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不同态度,以及对本国安全文化的不同认知使得双方在如何实现安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呈现不同倾向。

美国的安全观建立在单一、排他的逻辑之上,遵循“唯我独尊”的霸权逻辑。首先,美国将自己视作全球的领导者。《战略》提出“在世界各地,对美国领导力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9~40页。

③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4月27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作出的指示》,《人民日报》2016年4月15日,第1版。

⑤ 胡惠林:《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如何定义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中国进路与未来思考》,《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8期,第115~125页。

的需求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强烈”,^①主张美国“应邀”为世界提供秩序,增加全球公共利益。^②其次,美国将全球问题和安全治理视作本国同他国的竞赛。《战略》中关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正在进行一场竞赛,以展示哪种治理体系最能造福本国人民和世界”^③的表述则是直接例证。再次,虽然美国以所谓“民主国家”来框定盟友范围,但是这样的盟友关系其实是单边性且具有极强操控性的。美国大力推行其所谓的“总统民主复兴倡议”和“民主发展伙伴关系”,^④并将其盟友划分为以北约、澳大利亚、日本等为代表的核心盟友,及分布于印太与西半球等地建立在“相同利益”上的联盟关系。在霸权思维的影响下,美国的盟友国家的外交行为自主性也会受到削弱。例如,美国希望将印度作为其“印太”战略的关键节点,但当印度为谋求其在地区与全球的利益时便会遭到美国的反对,进而引发两国的外交分歧。^⑤

有别于美国,中国坚持更为包容与务实的文化底色。中国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繁荣与合作,将合作与共赢视为鲜明特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⑥一方面,中国不以自身的价值观及国家利益为衡量合作的唯一标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搭建合作发展的国际平台,将它们的利益同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密切对接。另一方面,中国强调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进合作与发展。不同于美国将国家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做法,中国坚持“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⑦强调“多样性是世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② Riccardo Alcaro, “The Liberal Order and Its Contestation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3, No. 1, 2018, pp. 1 ~ 10.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④ U. S. Mission China, “Fact Shee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Abiding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Renewal at Home and Abroad,”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fact-sheet-the-biden-%e2%81%a0harris-administrations-abiding-commitment-to-democratic-renewal-at-home-and-abroad/>.

⑤ 周嘉希:《印度在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战略选择探析》,《学术探索》2021年第9期,第37~47页。

⑥ 何星亮:《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民论坛》2019年第21期,第6~10页。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58~59页。

界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各国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① 相关表述展现出中国对内坚持文化自信,对外推动文明互鉴的安全政策初衷。

四、建设和平: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影响比较

建设和平是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最终目标。在应对威胁、实现安全的过程中,国家行为体所采取的主动行为同样会对国际秩序与和平状态产生溢出影响。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差异最终会反映在和平建设这一国际实践之中。具体而言,中美对别国政府与对外合作的不同观点直接影响到了双方的对外关系行为,更是直接影响到地区局势、国际格局的稳定。

(一) 安全观与国际合作观:单边施压与多边主义

当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出愈发复杂的发展态势,政治对抗、经贸摩擦、增长迟滞等安全与发展问题日趋凸显。而多元行为体之间的国际合作成为摆脱上述困境的关键一步。对此,构建怎样的合作模式、奉行怎样的合作理念将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安全格局与各国的安全得失。美国的合作观建立在自我认知中的“民主”价值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单边施压。首先,在面对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安全议题时,美国认为应当“以我们的价值观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保持坚实的步调一致”,^②这反映出美国高高在上的合作观。其次,美国对于“合作伙伴”的态度同样非常强硬。例如,对于非洲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美国则希望以“针对人权、威权行为”的施压来解决,并以此来“深化”美非关系。与之类似,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也反映出了其霸权思维,《战略》全文共有67次提及“盟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文只有13次提及“联合国”且通篇并未提及“多边主义”,可见美国轻视“多边主义”的程度之深。不同于美国,中国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首先,中国的多边主义观念是建

^① 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的谈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8日,第1版。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立在《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之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认为“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阵营对抗、霸权主义……应当受到抵制和反对”。^①其次,中国在面对全球性议题时,倡导“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主张“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同时要鼓励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间社会积极参与,形成安全治理合力”。^②再次,中国奉行“走安危共担之路”的共同安全理念,即不以自身安全为唯一目的,不以他国发展为牺牲,坚持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惠及其他国家。最后,中国坚持以多边主义、对话协商而非单边霸凌来应对全球危机。《倡议》中曾旗帜鲜明地呼吁“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抵制“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阵营对抗、霸权主义”,^③主张以联合国为主要渠道解决相关热点问题。

(二) 安全观与全球发展目标:利益唯一与开放合作

安全观的另一重要议题即如何处理对外开放,如何看待全球化。^④对于对外开放的态度,对于如何平衡经济开放与供应链安全等类似问题的认识,都将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安全行为,进而影响到地区繁荣与全球发展。

美国将全球发展的重要性置于本国利益之后,形成一种“本国利益唯一,全球发展服从”的安全与发展理解。诚然,美国在《战略》中仍然持有一种“反对非市场经济行为、强调开放式经济”^⑤的对外开放逻辑。但从内涵上看,美国对国家开放与市场的态度建立在资本的逐利性及虚伪价值观的基础上。而当美国在国际经贸和国际分工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之时,其开放也就沦为“一纸空文”。《战略》中,美国就曾指责中国为谋求科技地位而损害全球市场的公平和开放,^⑥全然不提及美国自身为追求科技主导地位而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此外,“美国利益唯一”的理念和政策行为会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被公正地纳入全球

①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②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1版。

③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④ 沈静:《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14页。

⑤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⑥ 石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27页。

分工之中,无法真正地享受到进步带来的福祉。例如,美国组建起芯片四方联盟旨在维护其半导体的科技霸权,但这将使全球半导体产业陷入危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毫无好处。^①由此可见,美国的开放与发展其实只是“双重标准”,旨在控制技术高地,确保资本增长的最大化,却忽略了全球的发展利益。

与美国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对于开放的态度统合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愿景之下。首先,中国强调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应秉持包容、非对抗的合作态度。例如,《倡议》指出应建立“开放包容、公平合理、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②提倡将本国利益同他国利益紧密结合,注重开放与发展的互利共赢。其次,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立场不动摇。中国在坚持开放的基础上,防范风险、推动创新,从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贸的互利合作,指出:“我们必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③再次,中国的对外开放目的明确、成效显著,将共同利益作为开放的最终落脚。在具体路径上,中国始终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抓手,“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④

(三) 安全观与国际秩序构建:结盟政治与安全共建

当今世界,国际体系内议题的多元性使得国内、国外议题呈现出显著的融合趋势和复杂的互动模式。而安全观作为一种系统性的观念建构,既包含各国对具体的安全议题的认识与应对,又包含各国对“世界是如何运行、世界应当变成什么样”的综合理解。

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建立在结盟政治、利益绑定的现实主义逻辑之上,讲求“敌—我—盟友”关系的主体认知。一方面,美国将自己的安全利益不断扩

① 韩召颖、刘锦:《拜登政府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的逻辑悖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3期,第70~91页。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页。

④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第1版。

展和泛化,将其他主权国家的安全利益矮化并将之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捆绑。“美国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国。我们在每个地区都更强大,因为我们在其他地区都积极参与。”^①这一表述将美国谋求霸权的动机伪装为追寻其在全球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往往以强制性、暴力性的手段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通过“大家长”式的语言对其他国家进行“要求”与威吓。如美国要求“阿富汗永远不再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或我们盟友的避风港”,并称“将让塔利班为其在反恐方面的公开承诺负责”。^② 而在其外交实践中,美国将“大家长”式的单边行径进一步凸显。在2023年以来的巴以冲突中,美国就曾授意卡塔尔和埃及向哈马斯领导人发出制裁威胁,试图强压对方接受停火协议。这一行为不仅侵犯了其盟友的外交自主性,还会扩大中东乱局,但美国自己却能够在不损害同以色列关系的基础上获取调停人的“国际声誉”。

中国始终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建设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统合“和平与发展”两大关键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与具体路径,也是中国对于“构建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怎样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两大问题的重要回答。其一,中国认为的国际关系应当由国际社会携手共建,在安全方面起到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作用,并能够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此外,中国始终强调在国际互动中应当“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以此推动“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③ 其二,有别于美国将全球治理议题“武器化”的做法,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篇章内,有11处提到“共同”应对各类威胁,并涵盖东盟、中东等热点地区,以及反恐、信息安全、生物风险、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多重议题,并在文本中旗帜鲜明地反对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② Ibid.

③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将粮食安全(供应链)问题政治化、武器化”。^①其三,中国注重发挥多边合作平台的作用,不仅呼吁政府间国际组织发挥作用,也倡导非政府行为体发挥各自优势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不仅注重现存的传统安全议题和地区冲突,同时关注未来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五、结 语

发展需要安全的内外环境,安全也是一国发展的重要保障。^②一国对外发布的安全文本即是该国对国家安全局势与国际安全格局的思考。它是各国对于国家安全领域认识及思考的宏观化、系统性的表现。此类文本不仅塑造了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模式,也反映了不同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合作策略。中美两国拥有差异显著的安全观点,这在威胁认知、安全内涵与建设思维领域得到了不同体现。

美国的安全观往往侧重于权力政治和霸权逻辑,以单边行动和传统安全为抓手,旨在对“建构”中的竞争对手展开竞争和压制,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而中国更注重整体稳定与和谐的安全观和秩序理念,认为自身的国家安全同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之间可以同向同行。中国强调的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维护,更是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共享责任。

美国国家安全建设中的敌我逻辑与我国安全文化中的共同体逻辑是我们理解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的一把钥匙。在当下的外交实践中,美国政府“泛安全化”的话语取向和“小圈子”的实践模式正在不断加剧国际秩序的动荡。^③面对这一现状,中国更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要路径,厘清中西方的安全观差异,处理好安全与民众利益、国家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外交理念,也符合全球化时代下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①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② 陈志敏、苏长和、潘忠岐、张骥、郑长忠、孙德刚等:《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1期,第45~77页。

③ 卢凌宇、崔磊:《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3期,第76~97页;王传剑、贾保磊:《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年第2期,第1~26页。